

## 20 世纪初中国乌托邦小说中的庆典想象

张 杨 刘志权

〔摘 要〕 庆典想象在 20 世纪初中国的乌托邦小说中频繁出现,承载着作家的政治信仰与文学观念,象征着完美的秩序与典范的国家形象。在乌托邦与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影响下,作为药引的庆典时常自然地消融于现实中,想象的重心就此转移到道路探索上,但庆典作为政治象征的意义并未被减弱。在庆典想象中,国家走向公众化与戏剧化,随后,这个想象中的剧场国家又在世界即舞台观念的影响下走向现实,与乌托邦有关的文学因此成为一种行动。

〔关键词〕 20 世纪初;中国乌托邦小说;庆典想象;剧场国家

当托马斯·莫尔创造出“乌托邦”一词时,一种新的文类——乌托邦小说(utopian fiction)——也随之产生了。所谓乌托邦小说,即指那些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描绘另一种虚构社会的小说,如莫尔的《乌托邦》、贝拉米的《回头看》、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威尔斯的科幻作品等,20 世纪最初 20 年间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一批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小说也同属于这一谱系。乌托邦小说在当时中国的出现并非偶然,一方面源自于固有的乌托邦思想传统,包括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陶渊明的桃花源想象等;另一方面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包括贝拉米的《回头看》、日本的“未来记”小说<sup>①</sup>等。与古典文学中的乌托邦相比,20 世纪初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从时空维度到主体均呈现出了明显不同,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便是时空维度,表现为未来成癮与空间生长。<sup>②</sup>可以说,这是一种具有了现代性的乌托邦,它的形成与历史进化论不无关系,这也是启蒙的一种馈赠。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小说家那里,庆典成为表现乌托邦的便捷方式之一,这首先是由于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典”与“礼”本身即是密切联系的核心概念,并通常被作为衡量国家政治状况与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准<sup>③</sup>,所谓“政以礼成”<sup>④</sup>即含有此意。于是,借助于庆典想象,知识分子试图树立起国家形象的典范,

---

张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南京 210097);刘志权,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 210097)。

①夏晓虹在《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一书中指出了日本明治年间“未来记”形式的政治小说对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的影响。

②这里所说的“未来成癮”是指一些知识分子习惯于将未来作为医治中国之神方,甚至产生出了一种言必称“未来”的倾向,这就意味着乌托邦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时间问题;当乌托邦成为时间问题之后,其空间便不可能单单局限于那些与世隔绝之地,它开始生长,流动,从脚下大地到宇宙星空,几乎囊括了所有想象中人类历史所能充盈之地。

③《左传》有言:“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杨伯峻编注:《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 5 月第 2 版,第 725 页)在这里,“典从”、“礼顺”成为完美而不可敌的国家的象征,可见,“典”与“礼”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④杨伯峻编注:《春秋左传注》,第 918 页。

或者昭示另一种普世的政治秩序,并希望由此激励起受众对于美好未来的热切期待。不过,这些乌托邦小说中的庆典想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在辛亥革命之后,原本形态丰富的庆典渐归于一——对未来的双十节的想象,体现出乌托邦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能够体现这种关系的还有想象的位移——庆典时常消融于道路探索中,乌托邦本身不再是想象的重点,如何到达乌托邦才是。作为基于现实而又超越于现实的存在,乌托邦始终指向对现实的批判与变革,就这个意义上而言,乌托邦小说不是耽溺于幻想的文学,而是一种行动的文学,小说中的庆典就这样带上了行动的意义——通过这种神圣的仪式,庆典参与者与作者、文本受众等共同感知了一个理想的新中国未来,享受了那份由完美秩序所带来的喜悦与幸福,并由此踏上了通往乌托邦的道路。

## 一、政以礼成:属于未来的庆典

在讨论庆典想象之前,不妨先来看看什么是庆典。庆典通常指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与象征性的一种人类集体活动,包括了典礼、庆祝两种类型,其中典礼主要是“组织间的,政治上的”,而庆祝则偏向于“娱乐的,戏剧的,审美的”。<sup>①</sup>广义的庆典还可涵盖大会、军队操练等活动形式。如此看来,20世纪最初20年间中国乌托邦小说中出现庆典的频率不可谓不高<sup>②</sup>,其中最为常见的形式便是周年纪念,并时常会伴随出现博览大会、戏剧演出、议会、军队操典、学堂典礼等多种活动。从概念上看,庆典应是根据已发生之事实而组织起来的一种仪式,然而,在乌托邦小说中所出现的庆典却多建筑于想象的情境之上,象征着作家们对未来的五彩缤纷的期望。属于未来的庆典想象的出现,标志着转型期的知识分子认识中国、想象中国的方法已然不同于以往,他们运用庆典想象对抗支离破碎、丑陋不堪的现实,希望由此修补或重造另一种“现实”,以建造真正属于人间的天堂。于是,庆典及其本身所象征的美好未来成为一种救治之方,而其推动力量正是为政治的文学观。

首先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例,其中的“维新五十年大祝典”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属于未来的庆典,尽管梁启超对它的描绘算不上细致,但仍旧无法遮蔽其灿烂的象征意义。作者首先指出了庆典的时间——“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sup>③</sup>,从文中可知,这是一场建立在未来十年维新成功的“事实”基础之上的虚拟庆典,而其发生地则拥有真实的地理坐标——南京与上海。对梁启超而言,选择这样两个城市当然有政治、经济等层面的考量,但与时间因素相比,空间的选择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就作者所设想的乌托邦而言,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囊括其中,在某种程度上,南京与上海不过是一种地理符号的能指而已。事实上,当乌托邦的时间维度从一开始被强调之后,其空间维度就似乎处于不言自明的状态:包括但不限于现实空间。这样的乌托邦不再如莫尔笔下的乌托邦岛、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等小而封闭,相反,它成为可以不断生长、最终甚至能够包容整个宇宙的共同体。乌托邦空间范围的扩张带来了描述的难度,而一场浓缩的庆典恰恰能够较为完美地折射出乌托邦的全貌。

对于这场祝典,梁启超精心安排了一场大博览会,并特地声明这并不单单是寻常的陈设物品的博

①王霄冰主编:《仪式与信仰:当代文化人类学新视野》,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②所涉及的文本包括但不限于:《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1902)、《黄人世界》(未署名,1903)、《自由结婚》(犹太遗民万古恨著,震旦女士自由花译,1903)、《维新梦传奇》(惜秋著,旅生等续,1903-1904)、《狮子吼》(陈天华,1905)、《苦学生》(未署名,1905)、《冰山雪海》(李伯元编译,1906)、《黄金世界》(碧荷馆主人,1907)、《电世界》(高阳氏不才子,1909)、《新中国》(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陆士谔,1910)、《万周年纪念大会》(老谈,1911)、《新村》(煮尘,1912)、《环游二十万里铁道记》(剑秋,1912-1913)、《五十年后之国庆日》(独鹤,1916)、《民国十五年之双十节》(倚虹,1916)、《理想双十节》(程小青,1918)、《双十节》(赵君豪,1920)、《昆仑大会》(尘客,1923)等。

③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1902年第1号。

览会,而是各种学问、宗教的联合大会,也即一场文化的博览会。其实,小说的主体内容便是这场博览会上的一场演讲,演讲者是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觉民先生,这位孔夫子的旁支裔孙曾游学诸国,尽心力于国事,本次的演讲内容则是“中国近六十年史”。可以看到,梁启超所想象的未来新中国在本质上是儒家文化为底色的现代民主国家。然而,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以礼为基础的规范伦理与以仁为基础的德性伦理”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sup>①</sup>,但梁启超在想象未来中国时依然选择了庆典象征,并且很明显地流露出对儒家传统价值的肯定。看似吊诡的现象反映出梁启超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复杂的心理状态,他一方面尝试剥离传统文化中有碍发展的因素,并将西方民主国家作为乌托邦蓝图加以参照;另一方面也希望经过改造之后的儒家价值体系仍然能够成为未来中国的基石。在《新中国未来记》的“绪言”中,梁启超自言做此小说的目的是“发表政见,商榷国计”,以有益于国家前途,“救此一方民”<sup>②</sup>,而其救治之法便是通过象征未来的庆典:庆典首先提供了一种美好的图景,从而唤起民众心灵深处的政治激情;随后,庆典的前提被展现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在现实与庆典所象征的未来之间的可能路径被展示在读者面前,于是,事实与想象、文学与政治、现在与未来之间形成了某种互动关系。小说的“熏”、“浸”、“刺”、“提”<sup>③</sup>之功用就这样通过庆典发挥出来。

实际上,除梁启超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同样在想象未来新中国时有意突显中华文化传统,如尘客。他在小说《昆仑大会》中描绘了一场百年之后的盛会,目的是为宣告世界大同,地点则在昆仑山。在这次盛会上,分别由一位少年和女士演说了大同的原因,其中特别强调了科学与互助的重要性。作者选择昆仑作为庆典的地点是有意为之,因为在他看来,昆仑是“中华民种的文明发源地,向来为世界各种人所瞻仰”<sup>④</sup>,在这个被称为“龙祖之脉”的地方,古老的民族神话成长为现代的乌托邦梦想。在昆仑山上宣布大同成立一事体现出作者的乌托邦构想中糅合了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大同理想,而早在这之前,康有为就曾尝试将儒家的大同理想与西方现代制度相结合,从而建构一种超越于儒家大同的大同世界。其时,有意突出中华文化特色,或者说试图建构起以中国为主导的大同世界是非常自然的选择,这是作为被侮辱、被损害者对于未来的一种期望。当然,也有些知识分子在想象世界大同时更倾向于淡化民族特色,强调普世性,如煮尘,他的小说《新村》便可看作是建构世界性乌托邦的一种尝试。

需要指出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于乌托邦小说中的庆典想象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即未来的“双十节”纪念。如赵君豪的《双十节》便虚构了一场梦中的庆典,作者首先回忆了“国大富强”<sup>⑤</sup>的原因——振兴实业教育,之后应好友之邀共赴典礼。此时的飞机等交通工具已由国人自己所造,而工人代表则在典礼上得到了总统的表彰。显然,作者通过这样的双十节想象展望的是实业兴盛、政治民主的新中国。又如倚虹的《民国十五年之双十节》则想象了一场十年之后的庆典,重点描绘了军队的阅兵仪式,还出现了由上海商人捐助供国民免费就餐的“国民叙餐会”<sup>⑥</sup>。本来,“饭同食”在乌托邦文本中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暗示着丰富的物资、平等的秩序以及和谐的关系,出现在庆典之中更意味着产生此种秩序之国家的完美性。“双十节”作为当时国家的重要政治仪式本身即带有意识形态特征,这样的庆典想象所表征的乌托邦是带有强烈的国家色彩的,它很少或不再强调世界大同,而着眼于一个现代国家的建构。

无论何种形式的周年纪念都“提供了一种连续性”,使庆典具有了对抗目前难以把握的现实的力

①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142页。

②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1902年第1号。

③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号。

④尘客:《昆仑大会》,《浙江道路杂志》1923年第1期。

⑤赵君豪:《双十节》,《民心周报》1920年第1卷第45期。

⑥倚虹:《民国十五年之双十节》,《时报》1916年10月10日。



量,从而激发起人们的信心与情感。<sup>①</sup>它以其重复性与稳定性吸引着人们投向未来的目光,那些想象中的辉煌在周年纪念中得到巩固,反复降临的庆典传达出这样一种信仰:一旦维新或立宪或革命成功,那么中国就将会像小说中那样,40年、50年甚至万年之后都仍能维持这样的美好局面。庆典想象显示出知识分子对于未来的关注,然而,未来始终是不确定的,无人能够知晓或者体验,那个名为“现实”的东西似乎无时无刻不攫取着知识分子的内心,还未等庆典正式落幕便提前介入其中。

## 二、想象位移:庆典之前应如何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被裹挟在社会转型的浪潮中,他们意识到历史不再是循环往复的改朝换代,而当时中国的不堪现状与未来的缺席不无关系,于是,觉察到此点的他们毫不犹豫地将未来作为一种解药,以期刺激人们麻木的心脏,树起重塑现实的信念,唤醒改变现实的力量,乌托邦小说中那些美好的庆典想象便承担起了这样的功用。因此,属于未来的庆典既是终极目的,又是方法,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药引,引导着针对现实的革命。庆典的此种特性决定了它在小说文本中的呈现方式:通常仅仅出现在楔子或绪言中,引出对于乌托邦实践途径的讨论之后便将自身隐匿起来,也即庆典之后的内容并不是庆典之后会怎样,而是庆典之前应如何,想象的重心在此产生了位移。

首先仍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例,在这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乌托邦小说中,庆典仅出现在第一回楔子和第二回中,从第三回起便是孔老先生的演讲内容,也即黄克强与李去病等人如何建造新中国的历程,是关于支撑起庆典的“事实”的想象。这其实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在他看来,这样一部肩负“中国前途”的小说,无论如何“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不能不“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sup>②</sup>,象征美好未来的庆典固然重要,但似乎也无需去描绘过多细节,真正重要的不过是其所象征的意义——新中国,同时,更为重要的则是如何建造那样一个新中国。于是,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庆典就是各国全权大臣齐聚南京参与庆贺,各国名家学者同在上海开联合大会,“热闹”之外,似乎再无其它,并最终在孔老先生的演讲中自然地消散,而孔老先生本人作为联结过去与未来的介质也隐退于第三回及其后的文本之外。又如陈天华的《狮子吼》,小说一开始便出现的并不是庆典,而是恶托邦景象——一个已经亡了种族的混沌国。主人公悲痛于混沌国的亡国史,在噩梦之中有幸遇见轩辕黄帝,才目睹了一场“光复盛事”,而当他试图将那本记录了光复历史的图书(《光复纪事本末》)私藏时,却被警吏所拿,从而猝然惊醒。小说主体便是《光复纪事本末》一书中的内容,也即乌托邦的建造史。再如煮尘的《新村》,主人公因厌恶污浊人世而独隐于山中,却被告知其居住之处被征用以建造新村,他再次出走后偶然进入已建成的新村,并恰遇着“新世界大祝典”<sup>③</sup>,一位老人正在演讲新世界的历史。主人公试图疏离于不堪的现实,却终归失败,这其实也就意味着桃花源式的乌托邦已然行不通了。作为演讲者的老人从第二回起便退场了,庆典也就随之停止。在作者成为直接叙述者之后,他开始从孔子对于民智、民德的损害谈起,讲到中华民国成立、社会党成立、社会主义研究大会召开,以及一班志士如何建设新村,而这些均是现实中出现过的事件。

可以看到,以上这些文本的叙事模式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庆典的出现更多的是为了引出对于道路的探讨。为了能够使理想人物的精神与行动影响到读者,发挥政治功用,作者还经常用批注或直接说教的方式提醒人们应当如何。文本与现实的频繁互动被庆典所象征的光明前景所引出,随后庆典便消融于这种互动之中。事实上,在这一时期的乌托邦小说中,像这样作为药引的庆典还有不少,那么,为

① [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②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1902年第1号。

③ 煮尘:《新村》,《新世界》1912年第1期。

何庆典最终都如此自然地转向现实了呢?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与这一时期乌托邦的特点有关。正如前面所言,进化论的历史观是促成此时期乌托邦思潮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在西方的进步观念中,“进步的预设”便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作为终极目的。<sup>①</sup>在启蒙理性的信仰之下,乌托邦成为可建造的人间天堂。对于这样的乌托邦而言,讨论其实践途径应是题中之义。其次,与为政治的文学观有关。对此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学,尤其是小说成为了新民之利器、救国之工具,而乌托邦小说更是如此。作家在小说中虚构庆典、想象未来,本质上还是为了重塑现实,而如何重塑便成为了问题的关键。再次,就庆典本身而言,它作为一场尚未发生的庆典,建筑在虚构的时空与秩序之上,本身即是未来,很难再向更远的未来前行,最后只能返归于现实。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庆典在乌托邦小说中便往往消融于现实中,想象的重心就这样从乌托邦形态转向了乌托邦实践。

以上所列举的小说篇幅均相对较长且未完成,庆典则仅仅出现在了文本的开头,那么对于那些篇幅较短,且以庆典为全部内容的小说而言,是否避开了庆典之前应怎样这一问题呢?以独鹤的《五十年后之国庆日》为例,小说的主体内容便是民国五十五年北京某小学校所举行的双十节庆典活动——由老博士带领学生去国庆纪念油画馆中了解历史。显然,在这里,想象的重心仍旧落在了能够通往庆典的道路上。油画馆共有五层,第一层以五年时间为段,其余各层以十年为段,而油画馆周围正预备建造图书馆。这里,可以看到,展馆或者图书馆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乌托邦小说中,这类展览性质的场所本身便富有象征意味,它们所展出的不是别的,而是乌托邦的缔造过程,那些书画所呈现出的正是被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参观者透过展品想象并组装起一段近在咫尺的可能未来。也就是说,在那里,时间具有了三重含义:既是乌托邦的过去,也是现实世界的现在和它可能的将来——向前的道路就这样被展示出来。顺便一提的是,展品中所凝聚的时间并不是全部的历史时间,它过滤掉了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时间,使人们仅仅关注于所谓具有重大意义的时间,这种忽略日常生活的倾向很容易导致乌托邦在实践过程中走向简单粗暴。

由上,想象的位移在当时的乌托邦小说中普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庆典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作为药引的它仍有存在的必要,庆典所象征的秩序、所意味的国家形象对于当时身处黑暗之中的人们而言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没有了光明前景的展现,道路就失去了方向与意义。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将《新中国未来记》或者《狮子吼》中的庆典去掉,那么整个文本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甚至不能称之为乌托邦小说了,只能说是带有些许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庆典能够使这些小说成为乌托邦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庆典象征着善的政治秩序,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未来。如果将这些带有互文性的小说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中形态各异的庆典联结起来便是一个时代的未来蓝图。其次,庆典想象具有现实超越性,想象中的庆典与当下的现实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能够引发人们批判现实、变革现实的意愿。再次,它既暗示了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也预告了途径之艰辛,但并非不可达。正如鲍曼所言,如果一幅未来图景是乌托邦的,那么除非经过深思熟虑的集体行动,否则便不会变成现实。<sup>②</sup>换言之,如果是仅凭个人行为便可造就的未来图景,就称不上是乌托邦的。那么,庆典作为一种集体性活动便很好地寓示了这一点。它将人们拢聚在一起,使他们感受那种“植根于生理激情的亢奋状态”,并将这种激情升华为一种“富有想象力的理解能力”,“使人们能够理解自我及社会本质的意义”<sup>③</sup>。由庆典所激发起的这些情感成为重塑现实的强劲力量,人们在激情之中思考这个国家的政治,思考怎样能够造就全新而美好的未来,就算不认同于作者所提供的道路,也能够被

① 高瑞泉:《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② Z. Bauman, *Socialism: The Active Utopi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6, p.17.

③ [美]特纳编:《庆典》,方永德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蓝图的光明与绚烂所裹挟,从而向着唯一的目的地——未来——而前行。

不管怎样,庆典使得人们在作家虚构的特定时空维度中同时经历着一场国家、乃至世界的狂欢,而这场狂欢源自于一种普世性的社会秩序的形成。每个人都在这和谐与激情之中感受着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正义,享受着这份完美所带来的巨大的喜悦,满足于这个全新的国家的方方面面。此时的庆典甚至就是民族精神本身,就是国家本身,庆典同因它而聚集起来的人们一道成为关乎政治的宏大叙事,而其中那些激昂慷慨的表演则是双重想象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一种“剧场国家”形象。当国家走向剧场化,又恰逢世界即舞台观念的流行,知识分子也便成为了剧中人,他们的乌托邦小说创作不再单单是一种写作实践,更是一种社会行动。

### 三、庆典中的“剧场国家”:作为行动的文

正是由于乌托邦与现实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才使得乌托邦小说中的庆典常常消散于现实之中,最终变成了对如何变革现实的讨论。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有足够的理由将这样的文学创作视为一种干预现实、打造未来的行动,其中,庆典想象使乌托邦小说的行动性更为鲜明突出。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庆典塑造了一种“剧场国家”形象。这个概念借用于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兹,他认为19世纪的巴厘国家具有“展示性本质”,“它走向了一种排场,走向了庆典,走向了主宰着巴厘文化的迷狂精神的公共戏剧化”,“它是一个剧场国家”,从国王到农民都在这场戏剧中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些“公众仪式并不是巩固国家的谋术,而正是国家本身”,国家政治通过种种富有象征意味的仪式而展示出来。<sup>①</sup>在20世纪初中国的乌托邦小说中,中国实际上也“走向了庆典”,成为了“剧场国家”,成为了一场需要每个人参与其中的舞台剧,变得生动且具有表演性。也就是说,想象中的未来中国在庆典中被剧场化,又通过那些满怀乌托邦激情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实践而走向现实,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在此显露无遗。

事实上,国家在庆典中走向剧场化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与庆典本身的属性有关。庆典从一开始便带有表演性质,因此,庆典的参与者实际上也即创造者,他们在某种意愿的召唤之下,以自己为中介将这种意愿转化为实际存在,完成“从非现实到现实的过渡”。<sup>②</sup>对于小说中的庆典而言,它其实既是作者的一种创作表演,又是国家的一种政治表演。如梁启超笔下的“维新五十年大祝典”,在祝典中,各国使臣来贺,其场面热闹非凡,大有“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sup>③</sup>之势。另外,作为祝典重要环节之一的是孔觉民老先生在博览会上的演讲,他的出场极为隆重,身穿国家制定的大礼服,并于胸前悬挂了各种勋章,有源于国民所赐的、有各国所赠的,也有教育会所呈的等等。礼服加身的曲阜先生已不仅仅是一个演说历史的学者,更成为了儒家价值观念的象征,同时各种勋章也意味着这种价值观念的被认可与被推崇。在带有宗教神圣性<sup>④</sup>的仪式中,那包括一千多名外国人在内的听众对想象中那段维新历史进行了虔诚的感知。于是,在演说者与听众的共同努力之下,一个乌托邦的神话被缔造出来。“这样的神话包含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或者一个阶级的所有最强烈的愿望,这些愿望藉由本能的坚持一再浮上人们的心头,并使即刻行动的希望具有全然现实的外表。”<sup>⑤</sup>《新中国未来记》中对于立宪后美好前景的描绘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立宪诉求,而现实中以梁氏为代表

①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② 苏宏斌:《现象学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57页。

③ 杨伯峻编注:《春秋左传注》,第918页。

④ 夏志清曾将孔觉民的演讲与《妙法莲华经》上释迦讲道场面类比,见夏志清:《人的文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⑤ [英]鲁思·列维塔斯:《乌托邦之概念》,李广益、范轶伦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6页。



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也确实一直在为立宪奔走,在各方努力之下,终于促使清廷颁布了《仿行立宪上谕》。想象中的剧场国家就这样从庆典走入现实,并推动着现实发生改变。

其次,与知识分子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理解有关。他们通常“把二十世纪的世界理解为一个‘舞台’,各个国家都将在上面作为角色,而‘演出’文明和野蛮的相互搏斗与竞争的‘活剧’。”<sup>①</sup>如陈去病在《瓜种兰因序》中所言,“二十世纪之天下,一悲剧惨剧之天下也。我中国其殆为世界之大舞台哉!我国之君臣、之士夫、之多数国民,其殆为大舞台上之傀儡哉!”<sup>②</sup>在他看来,舞台之上已然形势严峻,而中国多数国民仍在酣睡之中,于是在与友人共同创办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上直言要“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sup>③</sup>,从而赋予戏剧以启蒙功效。其时,乌托邦小说文本中的庆典最常以两种形式出现:演说与演戏。在异于日常生活空间的舞台之上,演出中国与世界的种种,也正是在这里,过去、现在与未来,想象与现实都通过戏剧表演奇妙地交织在了一起。

以《狮子吼》中的“光复五十年纪念会”为例,宏阔无比的会场左侧便是金碧辉煌的大戏台,横匾是“我武维扬”,对联内容则是:“扫三百年狼穴,扬九万里狮旗,知费几许男儿血购来,到今日才称快快;翻二十纪舞台,光五千秋种界,全从一部黄帝魂演出,愿同胞各自思思。”<sup>④</sup>可见,陈天华亦将20世纪视为大舞台,而能够使中国在这舞台之上“现万丈光芒于世界”的正是代表千千万万新中国之少年的小生。有意思的是,作者还特地批注解解释此“新中国之少年”并非“日本横滨市保皇会中人”,显示出其与梁启超之政见的相左。如果说,少年象征着革命之后焕发全新生机的青春中国的话,那么,在梁启超那里,美好的未来则属于重振旗鼓的老大帝国。1905年,陈天华身投东海,想要以此悲壮行为唤起革命,回顾他的一生,无论是创作《狮子吼》还是最终蹈海而死,其终极目的不过是使国家拥有美好的未来,因此,文学在他那里,本质上就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于长河似的历史中不是个例,正是无数次这样的行动才使得历史前浪后浪,永续下去。

陈天华在小说中搭建戏剧舞台并借此建构一个剧场国家,在双重想象之中,作为观众的小说主人公之于舞台上的剧场国家而言,时而缺场,时而在场:当舞台之上展现的是“鬼泣神涕”的黑暗现实时,便吻合于主人公的日常经验;当被展现的是“璧合珠联”的未来时,便疏离于主人公的现实经验。在这一进一退之中,启蒙的力量透过作为异质空间的舞台显示出来。事实上,除了小说之外,还有直接以剧本形式构建的乌托邦文本,如《维新梦传奇》。这里顺便一提的是,当其在《大陆报》上刊登之时,仍然被标注为“小说”,可见当时小说概念的泛化。剧本描绘了一位失意之人在梦境中指点江山,重整山河的故事,其中涉及到了整个国家方方面面的改造,包括建路、采矿、讲武、劝学、裁官、训农、验厂、商战、外交、立宪等,最后在第十五出中出现了“大同盛会”的庆典。其实,用传奇的形式来建构大同盛世本身已经将国家剧场化了,庆典则进一步加强了戏剧效果,一种理想中的政治制度与国家形象在这场戏剧化的狂欢之中印在了人们的心底。

因此,与其说小说中的庆典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美好的未来,倒不如说庆典使我们参与到一场注定有着圆满结局的想象的革命中。小说家想要通过庆典重塑现实,其实也意味着现实中的人们能够成为能够造就庆典的主体。在传统礼制观念与世界即舞台观念的共同作用之下,一些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运用庆典想象并将其中的政治象征意义发挥到极致。他们通过仪式化的庆典对未来中国进行了一种理想化建构,使得国家、乃至世界都走向了剧场化。舞台上呈现出的国家形象带有浓厚的浪漫色

①张春田:《革命与抒情:南社的文化政治与中国现代性(1903-192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6页。

②陈去病:《瓜种兰因序》,《陈去病诗文集》(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22页。

③陈去病:《招股启并简章》,《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第1期。

④陈天华:《狮子吼》,《民报》1906年第2号。

彩,在舞台之上,另一种完美的秩序得以建立。事实上,知识分子在使国家走向剧场化的同时,也将自我置身其中,如此一来,文学创作便成为一种寄寓了政治理想的行动,而在这样的行动中,庆典始终作为旗帜而出现,它所凝聚的是能够创造另一种可能的信念。

20世纪初中国乌托邦小说中出现的庆典想象尽管形式各异,其背后的政治信仰也不尽相同,但它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虚构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sup>①</sup>。在庆典之中,国家被剧场化,随后人们在这种狂欢之中开始“对自己是社会的一员却不能平等地分享社会资源这一事实所固有的矛盾进行探究”,“不仅要对秩序进行重新确立,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可以替代现有秩序的其他一些可能性。”<sup>②</sup>正是由于庆典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才唤起了那些庆典参与者们内心深处潜藏的变革现实的欲望,他们也许有着不同的政治期待,但重要的是,他们都能够在那个整体框架之下汲取自己所需要的力量,这便是作为政治象征之庆典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蒋永华 石亚兵)

## The Ceremony Imagination in Chinese Utopian Novel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ZHANG Yang, LIU Zhiquan

**Abstra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various forms of imagined ceremonies appeared in the utopian novels in China, they embody the then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beliefs and literary concepts. The ceremonies symbolize the perfect order and exemplary national imag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utopia and reality, the ceremony as a drug guide (i.e. the substance triggering the effect of the herb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often naturally melted into reality, and then the focus of imagination shifted to the exploration of roads China could take. B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eremony has not been weakened. In the imagination of ceremony, the nation goes public and dramatic. Then, the theatricalized state moves towards reality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metaphorical concept that the world is a stage. The utopian literature has actually become an action of reforming the reality.

**Key word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utopia novels in China; ceremony imagination; theater state

**About the authors:** ZHANG Yang 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LIU Zhiquan,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

①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叻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2页。

② [美]迈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刘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